

文心雕龙

姚爱斌

诗学范式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
研究中心学术成果【文化诗学文丛】

主 编 童庆炳 执行主编 姚爱斌



文心雕龙

姚爱斌

诗学范式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
研究中心学术成果【文化诗学文丛】

主编 童庆炳 执行主编 姚爱斌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诗学范式研究 / 姚爱斌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438-8232-4

I. ①文… II. ①姚…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 ②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7523号

《文心雕龙》诗学范式研究

编 著 者 姚爱斌
责任编辑 龙昌黄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9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232-4
定 价 3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文化诗学文丛”总序

童庆炳

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文化诗学”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是从西方文学研究界输入的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隔。这种分隔给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要么是单纯关注文本本身，就文本解释文本，把文学研究与历史现实切割开来；要么是不顾及文本语言自身的实际，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把文学研究一味政治化、社会化。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它又不止于语言；文学作为艺术是审美，但它又不止于审美；文学是文化组成部分，但它又不止于文化的意涵。文学可以说是由语言、审美和文化三者交融而成的一种精神活动，因此，仅仅从语言、审美或文化的某一单一角度，都不可能阐释文学的复杂关系和丰富内涵。这样，作为教育部百所文科重点基地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为了推动和深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文化诗学”这一研究方法。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充分考虑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要点：审美的检验、文化的底蕴和文本的细读。

审美的检验。既然我们研究的是文学，那么就不能不检验我们研究的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对我们而言，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诗必须首先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才会去研究它。文学必

须首先是文学，具有审美性，有情感的脉动，更具体说就是要有人生命的气息，要有生活的独特情调，有可感可触的氛围，有音乐般的节奏韵律，有色彩斑斓的迷人颜色，才能娱人耳目，畅人胸怀，动人心魄。这样，我们才会关注它。如果文学缺少这些审美的品质，那么就不值得我们再更多去谈论它和研究它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出于对汉代辞赋一味敷陈景物而没有情感的投入这种不良倾向的不满，提出了“睹物兴情”和“物以情观”这两个命题。“睹物兴情”是说作者要从万事万物的生存中寻找感发情感的契机；“物以情观”是说创作中对所写的事物要进行情感的评价，使事物处于情感的笼罩之中，展现出审美的风姿。作家是这样，研究文学的批评家也应该是这样。只有做到“睹物兴情”与“物以情观”，创作者和批评家才能进入作品的审美境界，体会并揭示作品的审美意味。

文化的底蕴。具体地说，优秀的文学是不可能脱离现实和历史的，它是现实生活或历史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因此它的人物、情节、故事、场景、细节和言语等，总是一定的现实或历史语境的产物，必须放回到现实或历史的语境中去把握。就文本解释文本，是很难解释出深刻的文化意味来的。我们的古人从孟子开始就提出“知人论世”的解释学思想。这种思想绵延了两千年多年。到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对当时的学风不满，对长期的“经”、“史”分隔不满，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其后，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虽然学术界对于“六经皆史”有争议，但章学诚的论述的整个意思是清楚的，即便是讲“天人性命”这些大道理，也要“切于人

事”。这里所说的“人事”，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历史语境了。章学诚实际上主张把经学放回到历史中去考察、研究，这是很明智的。

杜甫有一句大家都欣赏的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它的好处不仅在词语对偶的工整上，也不仅在老年杜甫感受的真切上，更在与杜甫晚年的生活语境密切相关。杜甫自大历三年（768年）从夔州出峡，寻找他的弟弟和朋友，始终没有结果。在去世（大历五年，770年）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他贫病交加，多种疾病缠身，风湿病、偏瘫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病折磨他，右臂偏枯了，连耳朵也聋了。而且，这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寄身在一艘小船上，在长江、湘江和洞庭湖一带漂泊。他想念亲朋，想有个依靠，却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他登上岳阳楼时（768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的诗句脱口而出，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这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获得了对诗句意味的更深入的体会。

杜甫为什么在贫病交加的极度困难之时，会更感到“亲朋”的可贵呢？这就与中国长期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儒家讲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条是人生的大道，称为“五达道”。杜甫晚年出峡，想投靠自己的兄弟，是儒家的常情常理。从杜甫的诗中，我们知道杜甫有名可考的弟弟有杜颖、杜观、杜丰和杜占。杜甫晚年出峡，就是因为收到了在江陵的杜观的信，劝他出峡，才作出决定的。但杜甫出峡后，并没有找到这几个弟弟。虽见到了一些以前认识的朋友，但都无法更多地帮助他。另外，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是讲杜甫虽在老病之中，却仍关心着北方的战事（是年八月，吐蕃寇灵武等地，京师戒严。九月，唐军破吐蕃，京师解严）。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长幼”、“友朋”、“君臣”这些关系的意

涵。虽然西方文化中也有这些关系，但从来不像中华文化如此重视这些关系。

总之，在具体的现实或历史语境中阐释文本，揭示出文化的意涵来，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点。

文本的细读。文本细读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夫，文化诗学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来揭示作品的审美品质和文化意涵。文本的细读，除了要吸收中国古代诗歌、小说评点和西方新批评的优长外，特别要注意文本中“症候性”的语言、结构、细节、场面、人物行为等。“症候性阅读法”是阿尔都塞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提出来的。他可能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受到启发，认为作者文章的真正意思可能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完全在字面上。所以他主张在阅读中要把所读文章的一切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它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这样，他就特别看重文章中断裂、疏漏、空白和缺失等症候，力图揭示这些“症候”来获得文章的真正意义。后来，这种阅读法被借用到文学阅读中。人们认为任何优秀的作品都会有自身独有的征兆性的东西，如反常、异常、悖谬、含混、重复的语言、结构、细节、场面、人物行为等，那么批评家就可以通过对这些症候性的细读和分析，来揭示出作品的真正的意味，甚至是那些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等。鲁迅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症候性”的东西。如《狂人日记》的“狂人”把周围一切无关他的事情，都加以联想，最终都归结到人们合谋，要把他吃掉，连他的大哥也是合谋的“吃人”者。这主人公的非正常的悖谬的行为举止，都具有“症候性”，加以细读，即可发现鲁迅这篇小说的揭露封建社会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是一个反常的细节，也具有症候性。《阿Q正传》中的“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最后的“大团圆”等等都具有症候性，通过对这些症候性细节、场景、人物行为的

细读与分析，足以揭示出小说的深刻含义。

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整体，在检视作品的审美品质的同时，通过把文本放置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去细读，揭示出作品的真正意义和文化精神，这就是文化诗学研究文学的基本途径。这个方法对文学理论研究同样适用。所不同的仅仅是研究的文学文本变成为文学理论文本。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化诗学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的。今天的中国现实是，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国家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但现实中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衡现象，如贫富失衡，城市发展与农村滞后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失衡，收入提高与道德滑坡失衡，东部发展与西部落后失衡，生产数量与产品质量失衡……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不可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但如同前面所说，它的出现是要解决文学研究中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割裂，它的运用就是要培养人的全面的有深度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诗学的提出，高扬的是平衡的精神，实际上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向现实发出一个吁求：应从严重失衡的状态回归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本丛书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的题目不同，选材不同，内容不同，但在文化诗学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一点上面互相靠拢，并取得了的各具特色的成果。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文化诗学文丛”的缘故。

我们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他们的学术眼光落在“文化诗学”上面，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他们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和辛苦工作，也深致谢意！

2012年1月4日

序

童庆炳

多年前，姚爱斌从安徽大学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很快就摸到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表面上寡言少语，内心则充满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他为人很随和，跟同学和老师相处很融洽，但学术上则常有不同寻常的独立思考。其时，我正在给整个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课程。我的做法是，我先讲一个总论，再示范性地讲几个具体篇目，然后就由学生轮着讲。就这样，我讲，学生也讲，我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教学相长。我们的讲法，不是一般谈论，而是要将某篇先逐字逐句串讲一遍，把刘勰所写的篇章字句的意思都弄清楚，然后再深入讨论篇中提出的问题。

记得在不少同学讲完之后，轮到姚爱斌讲《文心雕龙》的“隐秀”篇。“隐秀”篇据纪晓岚考证是一篇残篇，原文只剩下三百多字，其他文字可能是由明人增补而成的。姚爱斌的讲解出乎我的意外，他对刘勰此篇中“隐”、“秀”的理解，对“文外重旨”的理解，对“复意”和“义生文外”的理解，都与已有的研究意见不同。按照一般的研究意见，“隐”与“秀”是意蕴和形象的统一，“隐”要求诗歌意蕴含蓄而有余味，“秀”则是形象的点睛之笔。姚爱斌则不这样理解。他认为“隐”是“隐篇”，而“秀”是“秀句”，这是刘勰的原话，要忠实于刘勰的原话。他极力说明“隐”是就整篇而言的，它与《易》的“四象

精义以曲隐”相通，“隐”应该是一种“寓意”，即诗篇中所寄寓的寓意。刘勰的“隐”论既是以《易》学“隐”论和汉代《诗》“比兴”诗学为话语前提，又是对《易》学和《诗》注中寓言理论的集中和融合。“秀”则就“自然会妙”、以“卓绝为巧”的诗句而言，其主要特点是“直抒胸臆，非傍诗史”（沈约语）。他以“朔风吹劲草，边马有归心”为例证作了分析，说明“秀”句具有感物而成、融情景于一体的基本特征。由于对“隐”和“秀”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因此他对一般研究者把“文外重旨”、“复意”、“义生文外”等命题与唐宋诗论中的“韵外之致”（司空图）、“情在言外”（皎然）、“不尽之意”（梅尧臣）等命题相联系，就很不以为然了。课堂上同学们因姚爱斌发表与流行研究不同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最后，我自己准备好的总结讲稿没有办法讲了，因为我的研究也是认为“隐”、“复意”、“文外之重旨”等是唐宋以后意境说的准备形态，与他的意见是相左的。我当时觉得他的研究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很肯定他对一般研究者结论的怀疑态度，在他的也许不成熟的意见中，正蕴含了新的突破性的见解。一个老师是要支持学生独立思考的，所以我肯定了姚爱斌的研究，希望他认真吸取已有研究的成果继续研究下去，也许从中会有真正的新的发现。可以说，这节课就为姚爱斌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埋下了种子。

我反复思考过姚爱斌的意见，觉得他的研究结果中蕴含了新见和突破。后来，姚爱斌提出要以刘勰的《文心雕龙》的诗学范式为题作博士论文，也获得了我的同意和赞成。我提出的是要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弄清楚，要把“隐秀”问题放到全书中去考察，放到中国整体诗学中去考察。他如我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得很成功，答辩时获得一致好评。如果要选什么优秀博士论文的话，那么姚爱斌的博士

论文是真的可以称为“优秀”的。

多年后，姚爱斌决定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我重新阅读了他的全书六章文稿。我的总体感觉是仍然觉得他的博士论文是具有创新性的，而且这些创新的见解，有理有据，有相当大的说服力。论文整体写得很成功，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新收获。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我们对于古代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可孤立起来。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纯粹作理论上的推衍，是不可能获得新鲜的研究成果的，也注定要失败的。姚爱斌的研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进入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历史语境，把《文心雕龙》中的基本诗学范式与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等思想文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的变异，联系起来思考（这一点正是“文化诗学”的一个关键特征），这样他所获得的结论就有了历史的根据。有了事实的根据，因而是具有说服力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姚爱斌注重文本的具体的解析。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段落，一个篇章，都进入到了他的研究视野，并予以具体的阐释，不是空对空地说一些陈词滥调。第三个特点，是非常重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无论是专著、论文，只要是有关系的，他都搜集到手，近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他并且对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细心的研究，哪怕这成果只对他的研究有些微的启发，他都加以肯定，表现了他的谦虚与好学；但对于他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观点，则会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并加以分析，提出他的不同意见。以上三点，表明他的研究重视过程，也表现了他的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

中国百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变化很大，特别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和 80 年代两次审美热潮的洗礼。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初，那是为了摆脱封建主义的文学政教思想，人们把眼光投到西方康德等学者的无功利的审美论上面。其中王国维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发表了重

要的《人间词话》，影响甚巨，形成了一种文学是“无用之用”的审美思潮。

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面临着清理“文革”留下的极“左”思想，文艺学术界那时兴起了审美热，认为文学艺术的特征是审美，一部作品如果经不起审美的检验，那就不值得我们多谈了。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一类的口号特别反感。于是邓小平说，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了，因为这个口号“弊多利少”。这种思想解放的言论更为当时的审美思潮推波助澜，整个社会解除了“文革”时期的审美“饥渴”，被审美的氛围所包裹。记得当时北京中央美术馆举办人体裸体艺术展览，排队看此展览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连远在外地的人也赶来“围观”。

受此影响，当时研究和教学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人，对于古代诗学中那种注重情景交融和韵外之致的诗学印象特别深。像“韵外之致”、“景外之景”、“情景交融”、“含蓄无垠”、“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诗学话语，成为评诗的重要标准。对于汉儒在《毛诗序》中所说的，《诗经》中的诗是为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的抒情特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等，特别反感，对于汉儒所说的《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等，更觉得是奇谈怪论。这就是 80 年代研究文学、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的学者的“心理定势”。所以当时学界给《毛诗序》的评价是：“‘五四’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横扫封建文化。对于《毛诗序》这一封建文化的突出典型、两千年来《诗经》义疏的中心，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考证和论证了《毛诗序》所作的各诗的题解，是用比附史书、穿凿附会的方法，严重地歪曲了诗篇的本义，它像层层瓦砾掩盖了《诗经》这座古代诗歌的艺术丰碑，从而把一部优美的诗歌

选集，变为封建政治伦理教科书。这些批判，对于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民主性的内容和艺术光华，启发了人们探索各篇的本义，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一种眼光遮蔽了另一种眼光，就这样发生了。

姚爱斌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意识到了这种以情绪代替学术的不正常的情况。所以他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诗学范式，就能以实事求是之精神，避免各种偏颇。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他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整体解读，特别是对作为“文之枢纽”的头五篇的解读，发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包容、汇聚和肯定了古代的两种诗学范式，一种是寓言诗学，一种是感物诗学。姚爱斌还认为，寓言诗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易》，“易”的身影于《文心雕龙》无处不在，甚至说“《周易》是深深嵌入《文心雕龙》的互文本”。论文详细梳理了先秦用《诗》的寓言化现象，如《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论《诗》，就常常是断章取义，不按照诗句的原意去理解，而是要赋予某种寓意。论文指出汉儒解诗的特点是充分利用“风”诗中的比兴修辞作为历史、文化和观念的嫁接点，把风诗剪辑为周王朝兴衰的历史，解读为“礼”的多种系列的符号。论文对汉儒诗学的政教观念中所蕴含的寓言诗学范式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论文对《辩骚》篇作了特别深入的研究，认为刘勰超越汉儒之处在于，他以六朝感物诗和南朝山水诗的审美经验为根据，在汉儒推重的寓言诗学之外，进而总结出了楚骚中的感物诗学。论文还细致阐释了《明诗》《诠赋》和《隐秀》三篇中所蕴含的两种诗学范式，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文心雕龙》寓言诗学和感物诗学的丰富内涵。论文认为《比兴》篇是刘勰寓言诗学范式的完成，而《物色》篇则是感物诗学范式的

① 夏传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第一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完成，其具体分析也很有理论说服力。

姚爱斌的博士论文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带有中国古代诗学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以前的强调“兴寄”的寓意诗学，是否具有独立的诗学意义？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否被后来发展起来的感物诗学和意境诗学所遮蔽？这是关系到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变迁的大问题，应该静下心来，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加以研究。另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感物诗学和意境诗学，是如何从“比兴”、“讽喻”那里起步，一步一步边变化边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感物诗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语境是什么？是谁或什么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姚爱斌博士论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所研究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结论，而且更在于它启发人们重新深思中国古代诗学的起源、发展和变迁等诸如此类的大问题。他的论文暗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

以上是我再次阅读姚爱斌博士论文的感受。姚爱斌正当年富力强，又喜独立思考，研究也很勤奋，我祝愿他在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1年12月11日

目 录

绪 论 _1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诗学范式 _20

一 《文心雕龙》之“文”的多层次语义系统 /20

二 《文心雕龙》诗学研究反思 /35

三 刘勰的“范式”观 /51

第二章 《易》与“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哲学基础论 _62

一 《文心雕龙》与“寓言” /63

二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范式的元范例 /74

第三章 《诗》与“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经典文本论 _88

一 “仁”与“礼”的日常寓言修辞

——先秦用《诗》的寓言化倾向 /88

二 汉儒《诗》学：“礼”之寓言修辞的系统化 /103

第四章 《骚》与“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诗学范式的新变 _123

一 《离骚》：反常、惊奇与应对 /124

二 《辨骚》究竟要辨什么——以诗学范式为视角 /133

三 关于《楚辞》的寓言诗学范式 /141

四 感物诗学的缘起与《楚辞》诗学中的感物诗学范式 /146

第五章 《文心雕龙》诗学范式对比论 _161

一 《明诗》篇：“诗言志”与“诗缘情”语境义另解 /161

二 《诠赋》篇：“写物图貌”与“风轨”“劝戒” /171

三 《隐秀》篇：“文外重旨”与“篇中独拔” /180

第六章 《文心雕龙》诗学范式的完成 _205

一 《比兴》篇：《易》《诗》《骚》寓言诗学的汇聚 /205

二 《物色》篇：《文心雕龙》感物诗学的总结 /220

结 语 _233

参考文献 _238

后 记 _248

绪 论

《文心雕龙》研究至今，已有论文 6000 多篇，专著 300 部左右^①，且每年仍有近百篇论文发表，也时有著作问世。在历代学人尤其是 20 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文心雕龙》研究已经成为文学、诗学、美学研究的显学——“龙学”。张少康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一书卒章说：“在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文心雕龙》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但是为了使《文心雕龙》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从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在新的 21 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应当为《文心雕龙》研究提出一些新的希望。……《文心雕龙》研究在继续深入解决 20 世纪尚没有能解决好的许多问题的同时，还应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努力把《文心雕龙》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②张少康先生提出了改变《文心雕龙》研究现状的四点设想：一是“发展史料与理论并重的研究”，二是“从文化史角度看《文心雕龙》”，三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四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范畴”。^③这既是对未来“龙学”研究方法的设想，也是对此前“龙学”

① 此据戚良德《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统计，成果截至 2005 年。

② 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88 页。

③ 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88—593 页。